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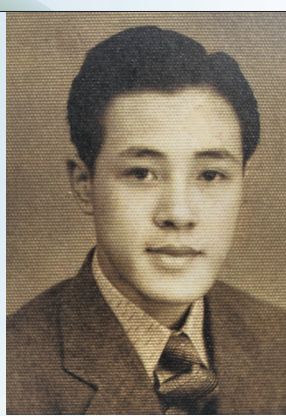


广东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 联合主办 羊城晚报社

党龄八十载 执掌七大报 升起香港第一面五星红旗

一位穿梭粤港 冒险犯难的 传奇报人

杨奇



青年杨奇在中国新闻学院毕业证书上的照片

茶餐厅里的入党仪式

11岁时杨奇辍学从家乡到了香港。不久后，贫病破产的父亲去世，他只得以一个少年店员的寒微身份走上社会。日日在堆满罗罗绸缎的柜台上，为生活富裕的人服务，他谋生，也认识世界：“原来人的命运如此天地差别！”

工余，天性极好的杨奇则千方百计地守住一盏自学的夜灯。他最初的起点就是一张张散落的报纸，《大公报》、《星岛日报》、《立报》一一走进视野……渐渐地，杨奇不满足于仅作为一名普通读者了，他开始向报刊投稿，向往那个书香油墨飘逸的世界。1940年，他考取了中国新闻学院，经由这所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香港分会的进步人士主办的学校，半工半读走进了新闻的场域。

很快，杨奇加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文艺通讯部（简称“文通”），并刻苦地练习写作，文学才有了长足进步，还与几位同道创办了一本进步刊物《文艺青年》，不到一个月就征集了1000多订户。当时正值“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杨奇除了在刊物中积极参与文艺论争，鼓励青年投身进步之外，还从《解放》杂志上誊抄揭露新四军被包围真相的电文，

秘密油印，并只身到香港中环一带去分发。

杨奇日益感受到手中这些文字的力量，但同时危险也在迫近。港英政治部遣人追查，便衣警察已经寻到了杨奇就职的地方……但此时的他，已更早一步寻到了心中的明灯——1941年3月12日，杨奇在一家茶餐厅的厢座内，正式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虽然在那特殊的现场，需要不时回避侍者的关注，更无法悬挂党旗，但这郑重的誓言点亮了他的一生：“为了全人类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我愿意牺牲自己的一切，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名家与南粤 4 图受访者提供署名者除外 文羊城晚报记者 邓琼

游击区办报出生入死

不久，香港地下党通知杨奇立即离港，到东江游击区去办报。从此进入到更艰苦、也更面临生死考验的环境中，他最兴奋的，却是能够全身心展开真正的报人生涯。

更没想到的是，作为游击队《新百姓报》的新编辑，杨奇还参与到接待1942年从沦陷为日本占领区的香港营救出来的爱国民主人士这件大事中。经中共南方局统一部署，从1942年1月至2月末，包括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等在内的一批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在香港地下党的周密安排下，由交通员引路，先是从香港越过敌人的海上封锁线到达九龍，然后徒步向新界大帽山进发，沿着崎岖山路，抵达宝安敌后游击区，全部脱离虎口。那时，东江抗日游击队的力量虽还很薄弱，时刻处于日本侵略军、伪军和国民党部队的夹击之中，但却为这些民族文化精英撑起了一方平安。

1942年1月20日，茅盾和邹韬奋等先生参观了白石龙山谷中的《新百姓》报社。韬奋先生赞叹说：“在密林深山中，用油印机出版报纸，真不简单！”当时，广东抗日游击队正要接《新百姓报》易名为《东江民报》，于是大家便现场请邹韬奋题写了报名，茅盾也潇洒地为该报副刊《民声》题名。杨奇就在左右研墨铺纸，这段记忆令他永难忘怀。

在《东江民报》的基础上，作为东江纵队机关报的《前进报》在1942年3月29日创刊。年方20岁的杨奇，接受党组织的委派，第一次成为了一家报社的社长。报社没有固定地址，杨奇经常和同伴们背着沉重的出版工具四处转移。在深山密林里，把军毡当帐篷，把藤篮作书桌，坚



东江纵队机关报《前进报》社曾设在广东罗浮山上朝元洞的观道内，年轻的杨奇社长正从里面走出

持写稿、刻蜡纸、油印出版。由于日军不断进犯东江游击区，蒋介石也派187师围剿，在敌我兵力悬殊的情况下，抗日游击队经常转移。有一次，日军、伪军、国民党顽固派三面夹击，企图把抗日游击队压至海边消灭。战斗最激烈的那一天，《前进报》人员竟只能乘艇出海，在小艇上写稿、编版，晚上才返回附近村庄写蜡纸和油印！

出生入死是杨奇这一段办报经历的真实写照。1943年夏，按上级命令，《前进报》社址迁到敌占区东莞莞街镇一间古老大屋内。这条巷子的另一边，隔着一堵高墙，便是伪军驻地，他们的粗言秽语不时传来，泼水声吵得之声相闻。

敌后办报，最大困难还是缺纸。杨奇又费尽思量去省城等地购买玉扣纸，对外说是要加工成卷烟纸批发到四乡零售。左邻右舍明明看见一批批玉扣纸被挑进厚街，不多久就有加工切好的“卷烟纸”运出去，也都不以为意。而高墙另一边的伪军更不会想到：运回来的玉扣纸，出门时已被制成颗颗“纸弹”般的光焰，一一射向敌人。

使“绝招”促《华商报》发声

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签署了投降书。中央指示东江纵队迅速派人到广州、香港，占领宣传阵地，创办报刊。于是东江纵队秘书长饶彰风到香港，负责筹备《华商报》的复刊工作，同时从《前进报》抽调杨奇等六人赴港，尽快创办一张四开小报，以便在《华商报》复刊之前及时传播我党的政治主张。

通过超常规的辛勤工作，这张由杨奇亲手催生的《正报》于当年11月13日就面世了。作为社长兼总编辑的杨奇，在创刊号上亲自编写了《国民党将领高树勋率部起义》的特稿，报道高将军率部一万余人在邯郸起义这一轰动中外的新闻，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令人振奋。

二战结束后，港英当局取消了新闻审查制度，而且默认中共在港开展公开的活动。《华商报》在这样的环境下复刊，在我党宣传日益受迫于国民党统治区严酷的文化钳制时，建立了一个极佳的海外舞台。《华商报》旗帜鲜明地主张“团结人民，打击敌人”，影响力从香港辐射至中国广阔的内地，也飞越海到了欧、美、东南亚。这样一张报纸，国民党当局自然会视为眼中钉。因此，当1947年8月杨奇被调到《华商报》担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时，面临着报纸在经济和发



香港《华商报》对民主人士联名通电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报道（资料图片）

在香港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次年，1922年杨奇出生在广东中山沙溪镇申明亭乡。1941年，19岁的杨奇在香港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因环境所迫，没能悬挂一面党旗；到了1949年10月1日，他终于组织《华商报》员工，在香港升起了第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杨奇接受过的全日制教育，连小学都没有毕业，却通过艰苦自学和实践中的磨炼，成长为亲手创办过五份报纸、主持过七份报纸的粤港著名报人。

他一生三度在香港工作：第一次离开，是1941年4月被港英当局通缉，受党委派奔赴东江游击区办《新百姓报》；第二次离开，是1949年10月率领《华商报》同仁一夜撤离，回到广州，加入创办《南方日报》，进而创办《羊城晚报》；第三次离开，杨奇则是完成了逾半个世纪的报人职业生涯，1992年8月卸任香港《大公报》社长荣休。

这位已近百岁高龄的传奇报人，如今在羊城的朴素居室中颐养天年，仍不时翻阅报章，心怀天下。在他身上，共产党人的勇敢坚毅与报人的敏锐和担当互为表里；他的业绩与阅历，亦可作为粤港新闻史乃至华南革命史的生动篇章，传扬后世。



1949年10月1日，杨奇应邀在香港新闻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上致辞，主张一定要悬挂新国旗——五星红旗

在香港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

重庆《新华日报》在1947年2月被国民党反动派封闭之后，香港《华商报》已是解放区以外唯一能直接传播中共中央声音的报纸。在解放战争期间，对于蒋管区人民如火如荼的反饥饿、反独裁、反内战斗争，解放区军民抗击国民党进攻的胜利，中共诚邀民主党派建立统一战线的主张等重大新闻，《华商报》上都做了翔实的记载。几乎可以说，《华商报》是一部记录解放战争全过程的“史书”。因此，在人们心目中，它不仅是一张报纸，也是通向中国共产党、通向解放区的一座桥梁。

一批又一批进步青年，到

《华商报》来，并由报社转送到内地解放区参加革命。国民党的军政人员也一个一个地设法通过《华商报》与中共接触，洽谈军事起义、经济起义的计划。这是《华商报》在版面宣传报道之外，所承担的另一重历史使命。也正是在这里，杨奇延续着昔日在东江游击区的际遇，又亲身投入到护送著名民主人士北上参加新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的重大行动中。特别是在1948年12月掩护李济深先生乘船离港的过程中，就是他乔装打扮，从港英特工层层监视的宴会上，“接”走了这位“重要的客人”。

1949年9月末，全国政协通

过共同纲领、国歌及国旗。国旗面积大小及五星的位置等都有详细规定，《华商报》刊登了这一鼓舞人心的消息。杨奇提议：“我们报社应该立即挂新国旗！”这得到该报领导班子一致赞同，遂派人到电车路横巷内一家缝纫店去订货，按尺寸大小制了一面标准的五星红旗。

1949年10月1日，当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远隔千里之外的香港干诺道中123号《华商报》社的天台上，全体人员也齐聚肃立，举行了隆重的升旗仪式。这是香港升起的第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亲手催生《南方日报》和《羊城晚报》

此时，作为代总编辑的杨奇已收到党组织的指令：鉴于南下大军中的新闻干部很少，一待广州解放，《华商报》即行停办，全体干部职工赶赴广州，参与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机关报《南方日报》的创办工作。杨奇再一次发挥了他在特殊环境下既大胆又缜密的组织能力，短短时间内，在维持日常出版的同时，完成了组织员转移回粤、秘密筹备停报等诸多事宜。

10月13日，南下大军已进至广州近郊，全城解放指日可待了。杨奇通知上班班的同事，把随身的行李包带回报社，以便15日早上轻装出发。14日下午，他亲笔写下了这篇《华商报》的休刊辞：

“别了，亲爱的读者！新生的祖国在召唤，我们必须回去；时代的号角在催促，我们必须前进！就是由于这个原故，本报停刊了！……让我们在伟大的祖国土地上相见吧，让我们在解放后的广州以新的面目与大家相见吧！”

等到1949年10月15日早上这最后一份《华商报》出街，



《南方日报》1949年10月23日创刊号（资料图片）



《羊城晚报》1957年10月1日创刊号（资料图片）

访谈

“韬奋先生的话激励我一生”

羊城晚报：从在东江游击区办《前进报》，到香港办《正报》《华商报》，解放之初在广州创办《南方日报》《羊城晚报》，“文革”后期办《肇庆报》，在香港过渡时期又主持《大公报》……像您这样一生奔波粤港，在战争与和平年代，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体制下皆有办报经历的老党员，可以说十分罕有！

杨奇：不，现在办报就好像“现代化+信息化”的军队作战一样，而我已经是“小米加步枪”时的退役老兵了。就像一只在粤港两地飞来飞去的候鸟，充其量只是留下一些指爪痕迹而已。不过，我衷心感谢培育我走上传媒事业的香港中国新闻学院，当时我只是香港军事评论报《天文台》的校对员，是听着学院刘思慕、乔冠华、恽逸群等名师的授课，阅读着从邹韬奋开办的生活书店中购买到的进步书籍（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才走上革命道路的。

羊城晚报：您曾经多次接触到中国现代一批进步知识分子、文化人。在中国新闻学院求学时是一次，在东江游击队接待邹韬奋、茅盾等是一次，再后来在香港参与安排民主人士北上又是一次，在香港与夏衍、廖沫沙等人同在《华商报》工作也是一次。他们对您的影响大吗？

杨奇：他们都是报业前辈，又是文化精英。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刘思慕先生，先是我的老师，后来又是《华商报》总编辑。夏衍先生是在1947年9月到1949年4月这一段时间，也几乎每晚都到《华商报》来，接触比较多。他们广博的知识

修养以及对人民群众的爱心，都给我很大影响，而且让我痛感自己水平不高，促使我要不断学习、不断提高。所以从读新闻学院那时起，我就养成了“人家睡觉我读书”的习惯，可以说是艰苦自学，一直保持。

羊城晚报：请您谈谈从邹韬奋先生那里受到的影响？

杨奇：我初次见到韬奋先生是在东江游击区的时候，日本法西斯占领香港后，他被营救出来，在1942年1月11日到游击区。与他同期在游击区茅寮中等候到大后方去的文化界知名人士还有茅盾、宋之的、胡绳等几百人。我那时在《东江民报》（《前进报》的前身）工作，负责接待这批“第一流的文化人”，觉得机会难得，十分荣幸。

邹韬奋没有什么架子，他把烤番薯当做最好的午餐，仅能吃到红片糖也被他戏称为“土巧克力”。部队首长派了“小鬼”替他洗衣服，但韬奋先生总是自己动手洗，说让“小鬼”有更多时间学文化。对于我们这些年轻的新闻“小字辈”，韬奋先生也总是耐心指教。

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件事，就是他离开之前曾在小溪边和我作过一次个别谈话。他说自己工作的最大愿望就是办好一份报纸，并且鼓励我也把新闻工作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还劝我在战争结束后尽可能多跑一些地方，增广见闻。当时，我真想向他发誓：“我一定要在党的新闻工作岗位上干到老！”但由于内心激动，还是没说出口。但这次谈话对我一生执着于办报起到了很大作用。

延伸

廖承志致蒋经国公开信是这样“入台”的……

1978年，杨奇第三度到香港工作。1982年7月下旬，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写了一封公开信给蒋经国，从幼时相识的家国情怀与凛然正义出发，促请国共两党再次合作。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宣传部部长的杨奇接到指示，设法将此信由可以进入台湾的报纸刊发，让台湾民众皆知。

《星岛日报》《华侨日报》是当时能够进入台湾的四份香港报纸中的两份，杨奇同他们的负责人都是老朋友。7月24日，他请《星岛日报》的总编辑周鼎、《华侨日报》的总主笔李志文到利园酒店喝下午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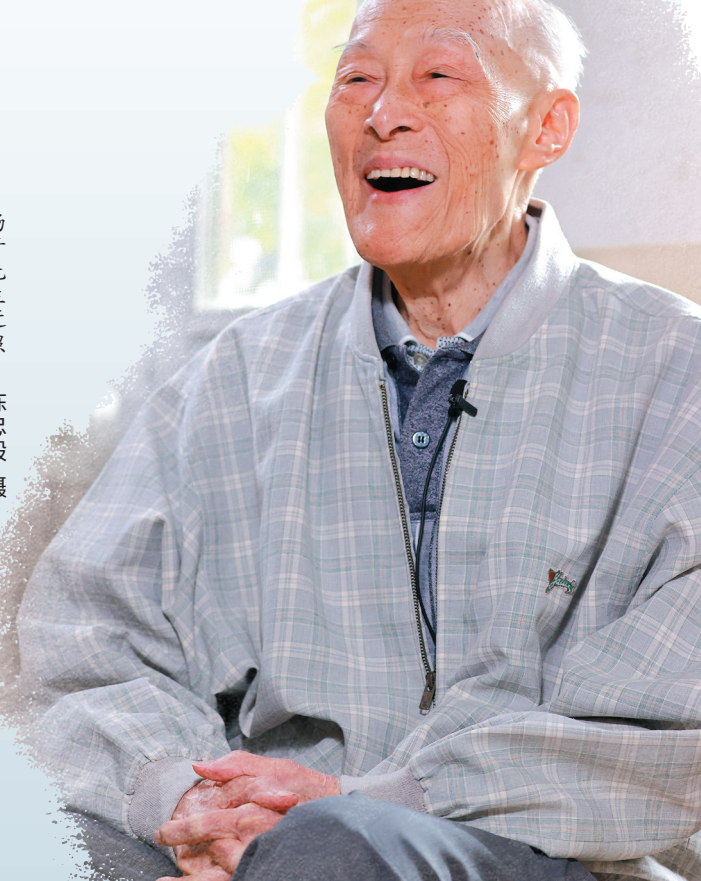
杨奇开门见山说：“明天，《文汇报》《大公报》都会刊出廖公写给蒋经国先生的公开信。但是，台湾同胞无法及时读到，希望能够借助贵报让它进入台湾。”他们一口答应了。

第二天，《星岛日报》全

文刊载，而且处理得十分巧妙，把这封公开信与台湾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孙运璿的谈话放在一起，合成双头条，大标题是《国共互怀情怀与凛然正义出发，促请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华侨日报》也在第三版刊登了这封公开信。

这样一来，两报竟然都顺利通过了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新闻检查关，往岛内各地发行。直到当天下午，台湾“情报部门”再想追回当天的这两份报纸，也只找到了一部分。其余顺利发行的报纸，让台湾民众听到了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的这一声春雷。

以廖承志公开信为切入点，在中国共产党和平统一政策的推动下，经过两岸人民的共同努力，海峡两岸持续了数十年的隔绝状态终于被一步步打破了。



杨奇先生近照 陈忠毅摄